

抒情 我被封杀的

わが封殺せしリリースズム

大島渚



「日」大島渚——著
周以量——译

我被封杀的 抒情

大岛渚

「日」大岛渚——著
周以量——译

わが封殺せしりりシズ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被封杀的抒情/(日)大岛渚著;周以量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3-1932-4

I. ①我… II. ①大… ②周…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5653号

我被封杀的抒情

(日)大岛渚 著
周以量 译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总策划: 方雨辰

特约策划: 陈希颖

特约编辑: 陈艺恒 陈 彻

责任编辑: 汪 欣

装帧设计: 崔晓晋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一版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932-4

定 价: 4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目 录

我的思索，我的环境	1
俘虏与天使	89
我生存的意义	145
附录：主要作品列表	233

我的思索，

我的环境

我的思索，我的环境

职业：让幻想成为现实

当下，我刚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题目是《仪式》^[1]。电影讲述了一个出生于九一八事变时的男子在战后二十五年中是如何举行冠婚葬祭^[2]等人生仪礼的。

这个主人公出生的地方是——不，这一点无所谓。不管怎么说，这是部已经完成的作品，问题关键在于将要拍摄的作品。

我不禁屈指算了算，到死为止我还能拍多少部电影。再过一年，我就四十岁了^[3]。到五十岁的时候，拍十部电影；六十岁

[1]《仪式》：大岛渚第二十一部导演作品，1971年公映。

[2]冠婚葬祭：本指成人、结婚、葬礼及祭祖等四大仪式，现泛指各种红白喜事。

[3]本文作于1971年。

的时候，五部；六十岁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我想尽可能活得久一点，也能再拍五部。共二十部。但这种计算方式有点理想化。

我希望相信即使不拍电影，只要本人还认为自己是个导演，那他就是个导演。至少如果一部接一部地拍，中间的空白时间再长，那也还是个电影导演。但是，如果这中间空白期有三五年，就很难说他的“职业”是电影导演了吧。

所谓职业，如果说最基本的是要能挣钱养家糊口，那么现在电影导演这个工作是不能成为“职业”的，意即它不是实业，只是“虚业”而已。

此时，我们会听见这样一种说法：不是挺好的吗？电影导演是艺术家。别骗人了。且不说艺术家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在现在的日本社会，电影导演与泛滥的艺术家根本无缘。

法律对这种情况也郑重地做了限定。根据从今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著作权法^[1]，电影著作权不属于作为创作者的导演，

[1] 1970年，日本新修订了著作权法，于翌年的1月1日起实行。日本最早关于著作权的保护规定是1869年的出版条例。1887年，版权条例被制定；1893年，版权条例被修正，版权法得以制定。

而是属于电影公司。我作为导演协会^[1]成员已经有近七年时间了，一直与这个法律的制定抗争，但由于力量单薄，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失败，以及这个时代人们的冷漠。我会一直记恨在心的。

现在是过于保护艺术家的时代。画家、音乐家、小说家，你们作为艺术家的权利由法律来保护。从受到保护这一点来说，你们是艺术家，而电影导演绝不是。

这也可以说是导演的光荣。有时，我在酒酣之余会大声呐喊几句：小说家、画家，你们也有过不被赋予著作权的时代！这种情况下，你们艰苦奋斗，创作了优秀的作品，著作权的概念因而渐渐确立了起来。因为前人所确立的权利，从一开始，现代日本的艺术家们就处于被过度保护的状态。与他们相比，今天未受到任何保护的、必须从创造创作条件开始的导演更能做出优秀的作品。

但是，这可能只是一种幻想。使这个幻想成为现实的努力，或更该说是为了使电影导演这个“虚业”作为职业得到人们认可的努力，使我变了一个人。现在的我是一个被摧毁了的人。

[1] 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创建于1936年，1943年解散，1949年再次成立，现任协会理事长为崔洋一。

过去并非如此。1954年，我作为副导演进入松竹大船制片厂工作。当时，坦率地讲，我为获得一份工作而感到高兴，因为那是一个就业难的时代，好几个公司的人职考试我都未能通过。在一位一道参加演剧的朋友邀请下，我半开玩笑地接受了松竹的考试。当时我连电影是一个一个镜头拍的都不知道。考试通过后，尽管月薪只有六千日元^[1]，但经历过因战争和贫困而饥寒交迫的青年无法拒绝这样一个正当职业。但是，制片厂的副导演是一份受尽屈辱的工作。我一直未能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为自己找了这份工作而后悔，想是否重新回到大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遭到演职人员谩骂。此后，我什么也不想，只是用身体来工作。在一阵胡乱忙活的过程中，我能够通宵达旦地工作了。参加工作将近一年左右，我待在剪辑间里，熬夜完成了电影。天亮时，盛开的樱花映入眼帘，这时，我不禁热泪盈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职业”感到自豪。

犯罪：对缺德的自省

在开始熟悉制片厂副导演这个职业时，我的心中产生了一

[1] 1954年，日本都市劳动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28283日元。

种期望：也许我也能当上电影导演。但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所谓“拍摄艺术性电影”的导演，也成不了那样的导演。当时我想自己可能会当一个拍大众化电影，并且票房成功的电影导演。我的期望十分微小，因此对当上导演后拍什么样的电影毫无头绪。

最终，从实际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到拍了好几部后，我才明白自己将会成为拍什么样电影的导演。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个最为这个世界上的犯罪行为所吸引的人。在对此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时，我就常常以某种犯罪为主题拍摄电影了。电影里的罪犯从不得已到喜欢犯罪，或者是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犯罪，形象各异。

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是罪犯，但随着电影里的犯罪行为不断升级，我梦中的犯罪场面也逐渐变得血腥，毫无例外都是从包括性变态行为在内的大屠杀开始。这些场面中混杂着非常现实的人物与虚构人物。其次是逃跑，这个场面常包含虐杀和性行为。梦里的罪犯戴着面具，装作好人，过了几年安稳的平民生活，然后突然间被发现，经过被捕和审判，最终被关进监狱。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罪犯没有一个被处以死刑。就在被处以死刑的那一刻，我似乎从睡梦中醒来，把他们记得一干二净。

少年时代，我曾读过一部通俗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印度尼西亚或其他某个国家的独立志士被殖民地统治者判处“无刑”的故事。所谓“无刑”并非无期徒刑，而是让他活着，关进地牢，把他从活着的人世间“抹消”。我对“无刑”这个词感到无比恐怖，记得有一段时间都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在梦中，我仿佛被判处了“无刑”。被关进永远不会打开的地牢里时，我常常从梦中醒来。不可思议的是，在梦快结束的时候，会出现现实中的人物，他们有时是家人，有时是电影厂的演职人员。因此，梦中的我的意识从罪不可赦的罪犯一下子回到现实，心情也变得极其现实：如果一直被关在地牢里，我就无法拍电影了，也许永远拍不了了，与我相爱的某某人也无法再次相见了。我不禁潸然泪下。

从这样的梦中醒来，心情绝对好不到哪里去。抱着十分黯淡的心情，我朝窗外望去。天还没有亮，这时，我突然陷入了一种错觉：我现在仍处于安稳的平民生活中，那正是我常梦见的戴着面具度过的时期。我之前是不是犯下了重罪？我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之人吗？

我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幻想呢？作为导演拍了许多电影后，这样的幻想就会升级，如果这样想，那么很显然这与电影导演

这份职业密切相关。我曾经说过“拍电影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拍电影需要劳力和经费，相较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电影收益的不确定性和期待的不可能性显然是一种缺德、一种犯罪。有此认识却仍去拍电影，还将自己的思想装进电影里，这不是犯罪又是什么？

再者，这既是我作为电影制作人的思想，也包含着成为电影制作人前的我的思想。拥有这种思想的我可能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这种思想究竟是什么？它仍然与革命有关。

革命：隐秘的渴望

我现在三十九岁。如果是革命家，这早已是死亡的年龄。弗朗茨·法农、切·格瓦拉、大杉荣、马尔科姆·艾克斯、马丁·路德·金^[1]……不知为什么，这些世界著名的革命家都在三十六岁或三十九岁时死亡——不，是被杀的。三十九岁是极限。不过，死神今年不会来造访我吧。即便死神降临，我也不会作为一个革命家死去。我现在不是革命家，此前也不曾是。尽管如此，

[1] 弗朗茨·法农，法国革命家；切·格瓦拉，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大杉荣，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运动家；马尔科姆·艾克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我总觉得“革命”这两个字一直在我的生命深处规范着我。

我自觉是不会成为革命家的，但可以说是与革命相近。六岁时，我的父亲去世，他给我留下了许多书。父亲是一介水产学家，但不知为什么给我留下了许多与社会科学和文学相关的书籍，而且其中一半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如河上肇、大杉荣、堺利彦这些人的书和杂志、古田大次郎的《死的忏悔》、浅原健三的《炼矿炉的火灭了》^[1]以及改造社的“一元钱”丛书中的“无产阶级文学集”等。我随便拿起其中一本就读了起来。

那是在战争期间，地点是京都一处阴暗大杂院的一个房间里，我们全家从阳光明媚的濑户内海的政府宿舍搬到了这里。我知道这些都是国家禁书，虽然有点黯然，但因此读得很兴奋。对我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是难以被否定的。因此，挺身而出进行抗争的斗士们互相以“同志”称呼，明天可能会被投入监狱，或许会被送上绞刑架，但他们仍奔赴战场去战斗。我不可能不被这些人的身姿感动，我也曾为狂暴镇压这些人的行为流下悲愤的热泪。

同时，我也走向了绝望，因为我无法成为勇敢的无产阶级

[1] 河上肇，日本经济学家；堺利彦，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古田大次郎，日本无政府主义社会活动家；浅原健三，日本社会活动家、政治家。

战士，也无法成为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理论的革命家。我身体虚弱，精神也是虚弱的，根本无法承受肉体和精神被压迫到极致。当振作起绝望的勇气，将《资本论》捧在手里阅读的时候，我才刚刚进入中学学习。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革命对我来说就只是虚构的故事。年轻士兵战死沙场，它却没有起到任何阻止他们死亡的作用。战争结束而且是战败，对我来说真是个晴天霹雳。人们开始在光天化日下大谈“革命”两字，被称为“革命战士”的人们开始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并呐喊。但我从来没想过要靠近他们。我自认为是不会成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我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丢掉了读书的习惯，开始迷恋上棒球。

但革命却向我靠近。它是以青共^[1]或学生自治会的形式向我靠近的。围绕日常学生生活的现实问题，他们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内心微弱的正义感和丢掉读书习惯后想采取行动的心情使我想与他们共同战斗，可以说我成了他们极重要的非党员活动家和同情者。但是，虽然共同战斗，我还是觉得他们的做法与我所信奉的革命相距甚远。因此，无论别人怎样劝说，

[1] 青共：“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简称，是战前日本的青年活动组织。

我都没有入党，因为我打心眼里就不认为这个党会闹革命。

然而，经过高中到大学这个漫长的季节，我失去了学生身份。在不得不获得一个新的身份（职业）时，当我不得不考虑自己如何适应这个社会时，我知道，一直自以为绝不可能成为革命家的我，比任何一位勇敢地呐喊革命的党员朋友还要渴望革命。这种渴望像重担压在我的心头，规范着我的行为。

我将这种渴望藏在心间，参加了工作。但我的职业却不允许我隐藏内心的秘密。我内心对革命的渴望原封不动地呈现在了作品里。

国家：黑太阳的形象

英国评论家艾恩·卡梅伦曾问我说：“你的初期电影里有闪耀着光芒的太阳，中途却又变成了太阳旗，这是为什么呢？”那是1969年夏末的一个傍晚，在威尼斯的海边，他花了两天时间采访我。听完他的问题，我陷入了沉思，紧紧盯着从海面上渐渐落下的刺眼太阳。在日本，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太阳。我没有人们自豪地称作“太阳的

季节”^[1]的青春，对我来说，一个人住在川崎单身公团住宅^[2]五楼一个三叠大^[3]房间里看到的夕阳反而更恐怖。夕阳照耀下，一栋栋房屋就像是堆积起来的火柴盒，尽收眼底。人们生活在这一个个盒子里的状况让我感到战栗。我真想从窗户跳下去，跳落在这些盒子上，这种诱惑时不时地袭击着我。为了抵抗这种诱惑，一到傍晚，我几乎都盖上被子睡觉，等到霓虹灯闪烁的时候，我出门到小巷子里喝点酒，寻求慰藉。

因此，我心目中的太阳象征着某种残酷的环境（置身于烈日的照耀下也不得不生存下去的严苛状况），以及人们在阳光反射下试图努力生存的愿望。这时的我非常热衷于捕捉环境和主体的理想状态，激情就像炽热的太阳。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年轻的我向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个信息。

这个太阳为什么变成了太阳旗呢？我并非刻意地想改变，只不过是结果如此。1967年2月11日，即建国纪念日实施的第一天，也是纪元节^[4]复活的那一天，我拍了部电影。我脚本里写

[1] 太阳的季节：石原慎太郎发表的一篇小说，曾获芥川文学奖。由此衍生出“太阳族”，特指随性、无秩序享乐的年轻人。

[2] 公团住宅：由政府组建、公共机构或私人资助的住宅公团提供的住宅，类似保障房。

[3] 约为5平方米。

[4] 1873年，日本政府将神武天皇即位的2月11日定为日本纪元日，称为“纪元节”。“二战”后，围绕“纪元节”展开争论，后于1966年将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